

# 海外经验还是本土语境？

## —— 闽南侨村旅菲华侨跨国居住空间“转译性”设计机制研究<sup>①</sup>

丁凡倬 李朝阳（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近代华侨的跨国行动形塑着其文化认同与审美观念，并体现在其居住空间之中。文章以闽南旅菲华侨为研究对象，立足设计人类学视角，通过“身份认同—空间塑造”的动态分析框架，将华侨生活场域的历时性转变作为线索，剖析其跨国生存经历对居住空间的“转译性”设计机制，试图理解其居住空间跨国设计实践提供新的解释维度。

**[关键词]**华侨华人；侨乡；居住空间；建筑文化转译；设计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 J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75 (2025) 06-0051-09

闽南民系在中国华侨史上是不可小觑的庞大群体，当前闽南民系以约 1080 万居首位。闽南民系主要去向为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跨国生活背景下，他们作为资本要素的连通者，对侨居地的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以贸易为驱动的跨国行动中，他们成了多元文化的转译行动角色，将跨文化审美要素作为建筑建造设计经验，逐步促进侨乡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由此，将“侨乡”视为一个具有相同社会特征与人群结构的整体，其不仅是由华侨与侨眷自主营建与栖居的物质空间，亦是孕育中外文化融合的文化交流空间，同时是佐证不同社会要素流动、交融、演化的社会空间。其作为中国乡村的特殊类型，价值不言而喻，深入研究其历史源流与当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部分。

### 一、“华侨”作为居住空间文化表征的转译行动角色

闽南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华侨”作为链接祖籍地与侨居地双向互动的纽带，在不同历史时期动态地塑造着“闽南侨乡”的地方性意义。<sup>[1]</sup>以“华侨—国家”的关联性视域看，华侨在不同时期对祖地认同经历了族群认同意识、地方认同意

识、国家认同意识三个阶段，而以“人—地”关系视角，华侨曾经历“离乡—思乡—返乡”的三个阶段。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闽南侨乡华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跨国交流历史与当今社会发展、侨乡文化与建筑遗产两大方面，研究各具特性，但又存在相互嵌套关系。关于闽南华侨跨国史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早在 1997 年，陈伟明通过对 16 至 18 世纪闽南华侨在菲律宾经济开发与历史贡献的研究，揭示了其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在菲律宾的早期发展中，闽南华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与文化的融合；<sup>[2]</sup>陈恒汉将视域放大到更宏观的闽南文化辐射区，将潮汕纳入闽南文化体系中，以闽潮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历史进程和空间走向的梳理，对其在境外扩散路径与体现进行形式分析，以“人群迁移”作为串联点，挖掘跨国文化体系之间的影响，为闽潮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举证，为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闽南文化视角。<sup>[3]</sup>

关于对闽南侨乡文化与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建筑学为主导视角，聚焦华侨历史建筑本体的文化表征。如杨思声通过对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文化景观的细分类型、建造工艺、多元文化表征进行梳理，并基于“外廊式建筑”在近代闽南侨乡的发展，提出其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在闽南地区的地域适

收稿日期：2025-05-13

作者简介：丁凡倬（1997—），男，福建福州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乡村环境设计机制及理论。

通讯作者：李朝阳（1965—），男，安徽亳州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乡村环境设计与理论。

①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创新研究中心 2024 年度开放课题“家国同构：闽南乡村礼制空间营建的文脉表征研究”（KF-20-24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应性繁荣,并通过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分析了该类型建筑在区域建筑、街屋景观和建筑单体中的多元表现。<sup>[4]</sup>二是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导视角,聚焦华侨历史建筑的生成社会背景与文化互鉴现象。如江柏炜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通过探讨闽南侨乡数量最多的洋楼类型“五脚基”的起源,归纳出近代侨乡住宅空间体制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提出异质空间(Heterotopia)与混杂体(Hybridism)的概念;<sup>[5]</sup>而王珊等研究者也加入闽南侨乡骑楼文化与“五脚基”建筑的讨论,其通过对遗存的纸媒、律条及建筑实体的综合分析,指出“五脚基”方言的产生与闽籍华侨在新马一带多语言环境下的翻译有关,且“骑楼”用语与“五脚基”方言在语义上有部分重叠,但二者传入闽南的路线和使用场合上有所差异。<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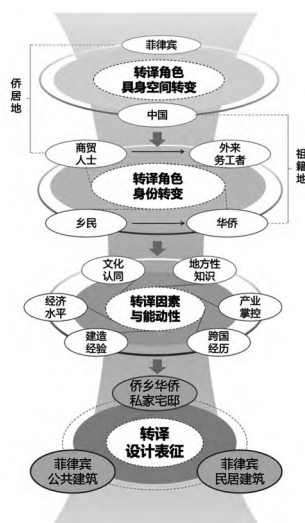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上述研究为当前侨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研究多数将视野放在中国场域,聚焦闽南华侨对家乡发展价值的宏大叙事,较少对闽南华侨在侨居国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智慧进行设计人类学视角下的微观挖掘与分析。其次,当前研究多数以静态视角深入分析闽南侨居物质空间的文化表征,但较少对闽南华侨在跨国经历下审美范式的动态塑造过程进行历时性研究,并缺少对其作为流动的社会群体如何影响周遭物质空间的文化特征融合与转译的解释。因此,本文建立“具身空间转变—身份转变—转译因素—转译设计行动”的设计转译分析框架,将“闽南旅菲华侨群体”视为其居住空间文化转译的行动角色,将其在跨国背景下的生活叙事及其居住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跨国文本资料、华侨口述史、田野调查等方式,以动态的视角将他们在菲律宾的生活状态作为研究时段起点,归国后在家乡建造宅邸的集体行动作为时段终点,从社会背景、行为特征与空间审美范式透析其文化认同转变与设计转译过程(图1)。

## 二、闽南旅菲华侨异国居住空间变化下的顺应与创造

### 1. 从“商船”到“Parián”:以商贸行动融入异国社会空间的生存智慧

区域文化特性的形成与传播根植于所处环境、地

理条件、气候等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是塑造文化独特性,形成区域文化现象与体系的客观要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地理类型与生存在这片土地的人民的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sup>[7]</sup>从人文地理学视角观察,闽南地区三面临海的地理格局塑造了闽南人独特的“海洋性格”,孕育了闽南社会开放、流动与冒险的文化基因。同时,海洋也是闽南人某一历史时期摆脱集权政治力量管控,通往南洋谋生的重要交通路径。这种地理性格在华侨跨国居住空间的演变中呈现为两种典型形态:早期依托“商船”的流动型居住空间与后期驻扎“华人管控区”的定居型商贸社区。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盛催生了闽南特有的“海上游牧”式生存模式,出海行动成为中国最为澎湃的经济活动之一。商人们跟随贸易船队往返于南洋,但仅通过贸易出访不会产生长久定居的现象,闽南华侨仅在往返的商船上生活起居,并以商船为商贸中心进行货品交易,亦携来自祖籍地的民俗习惯远航。如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就记载了类似的历史状况:“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官场者,其国闻周之所出。登舟与之杂处,酋长日用白伞,故商人必赍以为贐。交易之例,蛮贾丛至,随度篱搬取货物而去。”<sup>[8]</sup>华侨在两国间的来往,为当时正在进行开发的菲律宾马尼拉提供了许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时期总督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注意到有些物品在华人到来之前是缺乏的,并在其历史记述书籍《菲律宾群岛历史》中说:“中国人为马尼拉带来了各种钉子、铁皮、锡和硝石以及火药;蜜橙子、桃子、梨制成的糖果干,以及中国的其他水果等等……同时,他们提供无数价格低廉的装饰品。”<sup>[9]</sup>随着到访菲律宾的闽南籍华人日益增多,在当地形成一类具有显著特征的商贸群体,且拥有近似的生活方式、语言体系、民俗行为、商业模式,深度融入菲律宾的社会空间结构中。当地人为方便归纳这类人群,统一称来自中国的人为“Sangley”(中性词,无贬义)。关于“Sangley”存在多种解释,但学界更为接受该词是中文“生意”在闽南语中“Xiengli”发音的谐音,描述这类人群是为“生意”而来。<sup>[10]</sup>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该词是中文“常来”闽南语发音“Xian-gLai”的谐音,描述这类人群常来菲律宾。<sup>[11]</sup>这两种解释都恰当地描述了华侨的闽南文化根脉与侨居地的互动关系。<sup>[12]</sup>在此阶段“商船”既是跨国商贸交易空间,又是中华传统习俗传播的文化空间,同样也成了往返于中菲的闽南人的居住空间,“船居”成为闽南人在菲的主要生活方式,更成为具有复合功能的“移动社区”。这种商船居住空间具有典型的“阈限性”特征,它既不完全属于出发地也不完全归属目的地,而是通过持续的空间实践创造出的“第三空间”。

明代海禁政策使商船的流动性被阻断,华侨开始

在地化建构新的生存空间，其推动的空间转型具有转折意义。长期驻留菲律宾的闽南人选择走下商船融入当地社会，在本土进行商贸成为当时维持生计的重要经济形式。其商贸模式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宋元时期属于流动性质的行商，多从事远距离的远洋贸易活动，或充当菲律宾城乡商品互通的商业活动；另一类则是属于固定性质的坐商，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地点从事专营性、生产性的商业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闽南人涌入菲律宾，为便于统一管理，1581年西班牙殖民菲律宾政府在菲律宾马尼拉正式设立“帕里安”（Parián）。<sup>①</sup>1590年，马尼拉首任主教多明戈·德·萨拉萨尔（Domingo de Salazar）写给西班牙国王的呈文中写道：“在帕里安，可以找到各行各业的华工和手工业者，他们从事各种职业是如此熟练和聪明，以至于一旦他们看到西班牙工匠制作的任何物品，就会准确地复制它。一些物品已经开始在这里生产，与在中国生产时一样快，加工效果也更好，他们能够完善曾不擅长生产的物品；他们所造物品，有胜过西班牙直运来者，塑像亦佳，全岛各地之教堂所供奉的神像，皆出诸华人之手。”在信中他直接承认华人对马尼拉的贡献：“没有这些商人，这座城市将无法生存和维持自身，因为他们是精通所有手艺并且勤奋工作的大师，甚至收取价格也十分合理。他们之间互相进行商业合作并建立了企业，满足了殖民地的多样化需求。”<sup>[13]</sup>

不可否认，彼时的“帕里安”成为华侨长时间客居菲律宾的生存、生产与贸易空间，并在特定区域内组成小规模商业集群，形成极具特色的手工业生态。这得益于前往菲律宾生活的闽南人中很大一部分曾是工匠和工人，他们将手艺和经营作坊作为赖以生存的工具搬迁到“帕里安”。<sup>[14-15]</sup>这些工匠和工人是“帕里安”内部生产能力多样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因此，“帕里安”内的生产商除了服务于西班牙殖民政府的订单，也运行小规模手工业、制造业乃至餐饮业等服务于菲律宾社会的业态，同时演化出许多职业类型，包括草药医生、药剂师、厨师、面包师、鞋服匠人以及建筑建造工匠等技术工种，不断将手艺适应当地工具与材料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完成订单。此外，源于菲律宾与闽南地区拥有近似的气候环境，华侨也将深植于观念中的耕种习惯带到了菲律宾，他们在裸露地块上种植家乡带来的菜籽，并同时种植符合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饮食习惯的蔬菜，以获取额外的农业收入。在西班牙殖民时期，马尼拉共被摧毁又重建有9个“帕里安”，最后一个于1860年被摧毁，“帕里安”作为华侨商贸与居住聚集地存在时间长达将近300年。



图2 菲律宾绘画作品中的“帕里安”华人商贸、娱乐场景

从“商船”到“帕里安”的生存空间变化，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标志着华侨从“商客”向“暂居者”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包含三层空间转译的驱动力：其一，居住模式从商船的临时性转向社区的稳定性；其二，经济活动从远洋贸易转向在地生产，形成手工业集群；其三，文化传播从器物输出转向技术移植。统而言之，“帕里安”是闽南华侨在侨居地最为典型的聚集生存空间，尽管它仅是一个集中管理且面积有限的社区，不具有传统的街巷物理空间结构与边界，但闽南华侨的生存智慧也在其中尽数体现，其形成的社会文化系统，自下而上地影响着菲律宾社会的经济、商业、文化等各个层面（图2）。

## 2. 从“Parián”到“Binondo”：祖地文化基因对菲律宾公共建筑的隐性形塑

虽然“帕里安”为侨居菲律宾的华侨提供了较为固定的社区住所，但越发拥挤的人口密度增大了管理压力，于是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于1594年为华人在马尼拉王城区对岸独立设立了一个新区域，名为“比农多”（Binondo）。<sup>②</sup>但并非所有“帕里安”内的居民都能迁移至“比农多”，只有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或与菲律宾人结婚的中国人才被允许迁居，其余人员依旧只能生活在“帕里安”，因此在上百年间“帕里安”并未因为“比农多”的设立而被完全取缔，而是同时存在。在这种空间区隔策略下引发华侨两类行动方式：其一，“帕里安”作为传统管控社区的持续存在，居住在此的华侨形成殖民进程中的“显性抵抗”，不断强调且坚守作为华侨的文化根脉意识；其二，为获得生活与贸易自由移居“比农多”的华侨，只能在生存中利用“地方性知识”对周遭环境进行“隐性形塑”，从而存续自己的文化认同。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所解释：“弱势群体往往通过‘协商式抵抗’在统治结构中开辟文化存续空间。”<sup>[16]</sup>而正是这种强制性的空间分异，反而激发了华侨群体在“比农多”地区更为精妙的文化转译实践。

根据早期修士和传教士编年史记录，早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将石砖类建材引入菲律宾，精通运

① 市场之意，故也被译为“八连市场”，是当时菲律宾华人的贸易场所和管制性居留区。

② Binondo 是一个具有完整街巷形态、交通系统及生活配套的开放社区。





图3 1847年、1868 年版画中菲律宾比农多教堂形象与1900年摄影中塔楼顶部变化

用石材建造的华侨建筑工匠、泥瓦匠、石匠经常受雇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并且在建造过程中都潜移默化地输入了来自中国文化的意向性审美观念，产生了对公共建筑塑造的转译。例如，作为西班牙殖民政府归化华侨信仰最为核心的宗教建筑——比农多教堂（建于1594年），有一座塔楼与其相连，虽该塔楼和传统独立建造的中国塔不同，它和教堂属于统一体，延续了西式教堂的“楼—塔”关系，同时每个门楣、窗楣装饰都具备西式风格，但其结构与規制尽显中国特色。如引入了中国常见的梁柱施工方法，从而产生了“由大至小”的堆叠层级结构，而非建造一个单一的直线结构，并且据资料表明最早其塔顶是八边形瓦顶结构，即类似于中国宝塔顶部的特征，到20世纪末被迫改至现在的西式穹顶结构（图3）。其整体建筑结构呈五重八角结构，与中式设计语义亦不谋而合。在中国宝塔规制中，“五重”源于象征着佛教宇宙观中的“五方”“五智”“五行”。而“八角”结构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卦”“威震八方”的语义，八角形在中国古塔建筑中颇为常见。<sup>[17]</sup>此外，在物理学视角下，八角形塔的内角均为 $120^\circ$ ，具有显著的稳定性优势，这种设计在地震时能够提供更大的受力面积，从而有效地分散地震波，这也是应对位于地震带的马尼拉的建造智慧。

有趣的是，这种中国文转译设计语义倾向也渐渐走出“比农多”，持续扩大其对马尼拉公共建筑的影响力。如1756年建造的第八代单体建筑式“帕里安”（名为Alcaiceria de San Fernando），该建筑由华裔建造师安东尼奥·马佐（Antonio Mazo）主持建造。<sup>[18]</sup>通过审阅收藏于塞维利亚印度群岛档案馆的设计图纸，我们可发现其具有八角形围合式二层空间结构，底层是商贸空间，上层则用作住宿，在建筑内部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广场，而建筑本体的入口、窗户位置均形似闽南土楼的空间规制（图4）。<sup>[19]</sup>中国文化对菲律宾公共建筑的转译不限于以上案例，其在公共建筑室内外建筑建材装饰、空间陈设等方面悉数体现，奠定了本文闽南华侨跨国“转译性”设计整体叙事中的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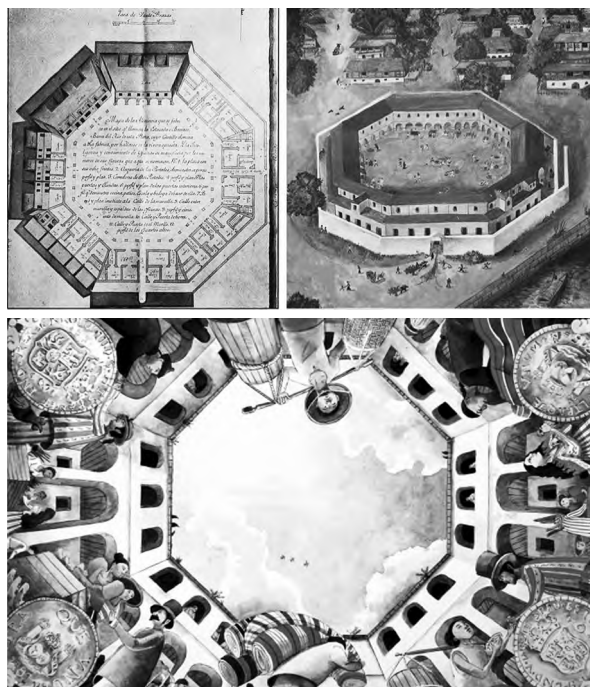


图4 建筑平面图纸与绘画中的Alcaiceria de San Fernando阶段。

### 3. 从“Bahay kubo”到“Bahay na Bato”：菲律宾民居建筑范式演进与华侨的互动关系

走出“帕里安”管制的华人在菲律宾进行贸易活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在17世纪到18世纪间，跨国贸易导致了菲律宾新经济阶层的崛起。作为身份的象征，经济条件改善的菲律宾华侨们开始建造改善生活水平的宅邸，并且深受帮助殖民者修建公共建筑经历的影响，他们使用石头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然而，1645年，马尼拉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许多由石头建造的建筑倒塌，坚硬的西方石头建筑似乎无法适应本土地质状况。于是一种融合菲律宾本土“Bahay kubo”<sup>①</sup>建筑开放通风、坡面屋顶与架空起居的空间特性，同时吸收了西班牙与中式设计语言的双层建筑在

① Bahay Kubo 是菲律宾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建筑形式，其名称是基于西班牙语短语 Cubo（意思是立方体），而 Bahay 是菲律宾语中房子的意思。



图5 1835年版画中马尼拉的城市图景

菲律宾开始生成，被命名为“Bahay na Bato”。<sup>①</sup>该建筑类型与菲律宾本土建筑“Bahay kubo”的结构性差异在于在建筑建造中吸收西方建筑砖石砌筑技术和石灰泥工艺，将石质材料作为建筑结构基础，同时加入中国建筑中的榫卯结构和精细木雕，影响了其二层木制框架的建造方式，尤其是梁柱接合处的稳定性设计和使用巨大的木桩来应对菲律宾多地地震的地质环境，大大延长了建筑的生命周期；在建筑装饰方面，华侨将中国传统建筑韵味的各类坡屋顶样式造型运用至自家宅邸之中，部分屋顶还运用简化的“鸱吻”“宝塔”等正脊中式寓意装饰，并且屋顶使用由华人瓦厂生产的曲面赤陶瓦进行铺盖。此外，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也遵从闽南传统建筑中的对称式布局，方便家族成员共同居住。此时建筑中的中式装饰符号虽然得以显现，但华侨仅能通过简化特征的方式来应对殖民政府的管控，并没有引入完全还原的装饰细节。这类建筑最先大量出现在华侨集中的马尼拉等贸易港口，随后通过华人商业网络向内地扩散，形成菲律宾本土建筑的重要范式，也因在菲律宾本土生成，在建筑文化中被认定为菲律宾现代化本土建筑的基础原型，也被称作是菲律宾人的“祖屋”（Ancestral houses）。

菲律宾本土建筑范式的转变，映射出闽南华侨从三方面间接影响了菲律宾本土建筑：其一，华侨工匠参与“比农多”公共建筑建设的实践经验塑造其对建筑文化的审美范式，并在建造贸易网络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菲律宾民居住宅建筑形制的糅合式创新；<sup>[20]</sup>其二，闽南华侨在建筑建造时，尝试引入部分中国传统建筑木质建造方法替换传统西方建筑纯石材建筑结构，以应对菲律宾的地质结构，并在实践中获得正向反馈，进而直接影响菲律宾本土建筑范式；其三，大量闽南华侨商人在菲律宾经营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产业，从生产阶段对建材装饰进行干预，间接影响了菲律宾本土建筑细部装饰的选择。<sup>[21]</sup>这一过程实质是现代性、本土范式与外来建造经验三重力量交织的产物。这一时期，“Bahay kubo”“Bahay na Bato”与西方洋楼共同存在，呈现出多建筑体系混合的城市景象（图5）。



图6 菲律宾民居建筑风格演进图

西班牙时代的末期与美国殖民初期，文艺复兴风格席卷菲律宾，新哥特式、新罗马式以及折中的组合风格装饰在建筑上流行起来，最先体现在教堂和公共建筑上，而后也影响至私人住宅之中。因此，包括华人区在内的许多新私家建筑开始出现圆柱、壁柱与女像柱等柱形结构，拱门、彩色玻璃窗、百叶窗拱廊等西方建筑细节也层出不穷，并且出现明确的外廊结构。建筑外部的装饰上，西方建筑元素的占比也不断扩大，但这些私人住宅在功能、空间结构和材料上仍延续“Bahay na Bato”上下层材料分异且多文化体系融合的建筑特征。到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中后期，全球化影响使菲律宾建筑业、施工方法以及建筑材料发生现代性转向，浇注混凝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石块、砖与木材。因此，大多数房屋的承重结构框架由底层外墙和混凝土柱组合而成，依靠其刚度来保持稳定，木柱材料渐渐从承重结构体系中退出。立足于浇注混凝土建筑的强可塑性，菲律宾“Bahay na Bato”建筑的造型变得更加多样化，同时开始持续呈现现代化审美特征，特别在1920年前后，菲律宾富人阶层开始兴起“Mansion”<sup>②</sup>建筑风潮，其流线型现代风格的圆滑曲线和光滑表面与“Bahay na Bato”复杂细碎的装饰符号形成对比，但同时又更加显现出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征，弱化了菲律宾本土建筑特性，尤其应对热带气候的架空结构与坡面屋顶也逐步被不断强化的通风与排水系统所替代。此外，建筑不断拓展其内外部空间结构，楼层数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实用主义美学特征开始显现。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元素选择上其与“Bahay na Bato”建筑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依旧延续多文化糅合的风格（图6）。

从技术史视角看，闽南华侨与菲律宾民居建筑体系演进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华侨将参与殖民公共建筑项目的经验转化为私人宅邸的营造范式，形成了空间营造的“公共—私人”双向技术流动。然而，随着华侨长时间的驻留，他们也逐步融入菲律宾国家文化认同中，开始减弱原生文化体系的创造力，趋于跟随菲律宾社会文化之变化而重塑个人的认知体系。正如在菲律宾殖民时代后期政府时期的转变，新兴建造技术与材料的引入与迭代直接影响了本土建筑的现代化转

① Bahay na Bato 是一种起源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其名称字面意思是“石头屋”，它是传统 Bahay Kubo 建筑的演化版本，其吸收了多种建筑风格，引入了多样化的建筑结构、装饰与材料，更符合现代生活方式。

② Mansion 即“豪宅”的意思，是指在私人土地上建造的巨大而豪华的单体房屋。其不同于贵族大占地面积的“庄园”，Mansion 注重建筑本身的精细程度，其占地面积相对狭窄，庭院面积较小。



向,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华侨的建筑认知。这种认定模式作为一种建筑文化认同具象化形式,在潜移默化中营造着海外华侨对于居住空间形式审美多样化、复合化的倾向,也直接影响华侨归国建造宅邸的审美选择,归属于本文闽南华侨跨国“转移性”设计整体叙事中的第二阶段。

### 三、闽南旅菲华侨宅邸的跨文化设计转译行动——以晋江梧林侨村为例

#### 1. 何以归家：生存压力下闽南华侨归乡起厝的“转译”行动背景

持续涌入菲律宾的华人似乎与殖民者、土著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成独特的“第三文化”身份。但是华人在商业与制造业上的优势,遭到严重嫉妒。尽管殖民政府称赞中国人的生产力突出且具有商业头脑,并能够很好满足一切生产需求,但同时他们又恐惧其势力扩张,致其对华侨的定居政策在“利用”与“驱逐”间摇摆,试图通过采取对“帕里安”租户收取高租金以及一系列不合情理且繁复征收的税收来控制 and 约束华人贸易的积极性,或是逼迫他们归化菲律宾。持续压迫的生活状态引发在侨华人强烈不满,例如1603年菲律宾华人曾发动大规模抗议,西班牙总督动用了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抗议者,并几乎完全摧毁了“帕里安”,那些逃过一死的人被驱逐回中国。但几年间,殖民政府发现大量中国人不再存续于菲律宾社会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无法如往常一样运行。<sup>[22]</sup>于是,殖民政府又通过滞留当地的华人招呼其亲友回到菲律宾,并为返菲华人重新建造“帕里安”,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和生意,但紧张的关系控制仍在不间断地隐隐作祟。1639年、1662年和1668年,在严苛的殖民地政策下,华人与殖民者的信任危机持续爆发,为反对重税而进行的抗议活动,再次被严厉、暴力的手段制止并遭受恶意报复,每次都以对华人住宅区的破坏和摧毁而结束。随着1860年最后一个“帕里安”被拆除,华人聚居生存的空间结构正式瓦解,走向流离失所的境地。<sup>[23-24]</sup>

海外生活状态的崩塌,加速了大批华侨回国的进程,如菲律宾华人研究者乔治·惠特曼(George Henry. Weightman)所述:“中国福建南部的人群以商人、工匠、学生、难民和早期移民的家庭成员的身份来到菲律宾,但一般都是暂时的旅居者,他们希望回到祖国找家人后埋葬在家乡,或者向亲戚展示所提升的经济水平。他们的文化依恋、忠诚取向仍然是对中国的,而不是他们常年生活的菲律宾。”<sup>[25]</sup>然而,清朝政府对华侨身份的不认同暂时限制了他们归乡的集体行动,无法回乡的华侨通过“水客”的帮助,将自己在菲律宾所得的部分钱财带回家乡补贴家用,但

此类非大规模资本转移的经济活动还未能形成“侨资本”,华侨对家乡的直观影响并未显化,“侨村”的村落属性也尚未形成,因此这个阶段华侨较多的乡村与一般乡村并无较大区别。

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发觉“闭关锁国”也无法磨灭闽南人善于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同时由于其面临战争赔款的实际问题,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极度困难。为吸引海外资金回流,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海禁。至此,身份被认可的华侨在国内外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侨资本”也更加自如地在“侨居地”与“祖地”之间流动,华侨对祖地的认同感也经历“脱嵌”到“返嵌”的过程,归乡“起大厝,盖洋楼”成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侨村”的独特风貌也不断被华侨宅邸建筑群及其外部环境所持续强化。

#### 2. 跨国认知的嵌入：华侨宅邸建筑中跨文化审美要素的融合与转译

归国后的华侨通过建筑私人宅邸深化与家乡的情感连接,海外文化源流与闽南乡土文化特征在此汇聚,主要表现为跨文化认知系统、中西杂糅式审美系统共同嵌入侨村私人及公共空间建构中,反映出华侨多元社会经历背景下的空间营造的文化表征,<sup>[26]</sup>泉州晋江的梧林村即为典型代表。

梧林社区位于晋江市中部,以“蔡氏”为大姓,占地约1000亩,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清末,梧林开始有成年男性旅居菲律宾,但妇孺老少等侨眷留居此地,旅居海外的华侨会定期回国建造精美宅邸或修缮旧屋,以彰显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村庄规模也随之逐渐扩大,建筑风格亦逐步多元化,具有“华侨建筑博物馆”之美称。华侨宅邸因常以“中西结合、华洋共存”为建筑风格而被称为“番仔楼”。

“番仔楼”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形制由“厝”向“楼”发展,并吸纳多种建筑风格于一身。例如,其外部的洋楼特征显著,尤其增设西式外廊结构更是在空间功能上有别于传统闽南建筑;此外,室内外引入的南洋元素更能直接反映出番仔楼的外来建筑韵味,例如,花砖、水磨石等铺陈材料,百叶窗、拱门、石膏线等建筑构造型,以及外国花卉纹样被应用在建筑的栏杆、门窗、山花乃至穹顶之上。但在外来建筑形式的包裹之下,番仔楼隐藏着传统闽南大厝的内核。例如,即使在西方建筑的影响下已失去完全对称的外部造型,但内部仍然保留了传统闽南大厝中轴对称的合院式空间结构,其功能性空间的布局也依旧遵循闽南宗族伦理关系与风水要求。

若保留传统闽南大厝的建筑要素是对宗族、礼俗与祖地文化认同的回应,那么华侨坚持引入的西式建筑要素则是显示海外身份、经济实力、光耀门庭的象征。在华侨家族相互影响下,建设中西合璧的“番仔楼”

	朝东楼(1930)	德鑑楼(1932)	德兜楼(1934)	修养楼(1934)	梦莱家声楼(1934)	五层厝(1936)	侨批馆(1938)
实景图							
立面线稿图							
闽南建筑特征	1. 中轴线对称二进四开间 2. 运用闽南传统砖石雕刻工艺 3. 闽南民居的院落式格局 4. 中文装饰(姓氏堂号、楹联等)	1. 中轴线对称二进五开间 2. 采用闽南建筑“漏窗”入口结构 3. 闽南传统砖、木、石雕工艺 4. 中文装饰(姓氏堂号、楹联等)	1. 中轴线对称二进三开间 2. 闽南传统砖、木、石雕工艺 3. 建筑内部空间布置上保留了闽南民居的厅堂式格局 4. 中文装饰(姓氏堂号、楹联等)	1. 闽南传统砖石雕刻工艺	1. 建筑主体屋顶采用闽南传统红瓦双坡形式 2. 闽南红砖建筑外部风貌 3. 闽南传统砖石雕工艺 4. 中文装饰(姓氏堂号等)	1. 中轴线对称二进三开间 2. 采用闽南建筑“漏窗”入口结构 3. 中文装饰(姓氏堂号、楹联等)	1. 中文装饰(楹联、时代口号等)
外来建筑特征	1. 吉罗马式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 2. 具有巴洛克式的灯罩、窗套、山花等元素 3. 设有电梯井	1. 吉罗马式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 2. 具有巴洛克式的灯罩、窗套、山花等元素 3. 出龟式建筑入口外廊结构 4. 洋式楼梯及铁艺栏杆 5. 南洋风格门楣、廊柱	1. 吉罗马式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 2. 具有巴洛克式的灯罩、窗套、山花等元素 3. 正面L型外廊结构 4. 洋式楼梯及铁艺栏杆 5. 南洋风格门楣、廊柱	1. 吉罗马式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 2. 具有巴洛克式的山花、窗楣等元素 3. 四面出檐形成圆形外廊结构	1. 菲律宾式三层骑楼建筑形制 2. 具有巴洛克式的灯罩、山花、窗楣等元素 3. 具有南洋风格的花砖等元素 4. 正面外廊结构 5. 南洋风格门楣、廊柱	1. 吉罗马式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 2. 出龟式建筑入口外廊结构 3. 具有巴洛克式的灯罩、山花、窗楣等元素 4. 南洋风格门楣、廊柱	1. 新英格兰式三层建筑风格 2. 出龟式建筑入口外廊结构 3. 侧面外廊结构 4. 三楼后方设有空中泳池 5. 运用彩色花窗

注：相同建筑特征通过同样明度的文字底色标明，无底色文字则是独有建筑特征

图7 晋江梧林村“中西合璧”番仔楼建筑群与其特征

逐渐成为梧林的风尚。但不同于城市的统一建设规划，华侨宅邸建造时具有高度自由性，这直接导致了侨村的建筑风貌——虽都是“中西结合”，但各具风格特色，无固定建造章法可传习（图7）。

梧林的“番仔楼”作为全球化席卷下的跨文化融合式建筑类型，其在生成过程中如何融合与转译多元文化仍值得探究。当前，对其阐释维度更多聚焦于闽南华侨的海外经历与审美在本土建筑上的体现，是华侨具身于中国本土后才生成的特殊建筑类型。但这也引发笔者思考，若大量梧林人的侨居地皆为菲律宾，为何在回国建筑“番仔楼”时，不直接沿袭菲律宾体系成熟且具有闽南建筑特征的多文化融合式“Bahay na Bato”民居建筑类型，而是引入多种非固定形式西方建筑特征要素与闽南本土建筑要素进行融合？

回顾旅菲华侨的历史片段，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从社会心理角度判断，在菲律宾生活时，华人作为外来者长期受西方殖民者的管理与限制，某种层面将西方殖民者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品位视为高级权力阶层的象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其《社会比较过程理论》中曾说：“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能力，倾向于向上比较(Upward Comparison)，即与更高阶层或更成功者对比。当物质条件提升后，个体会以更高阶层为参照群体，模仿其生活方式以缩小心理差距。”<sup>[27]</sup>因此在回国后，相较于菲律宾文化体系下的建筑形制，其更倾向于大量使用西方建筑元素，以彰显自身作为旅菲华侨的品位与社会地位。其二，从文化现象上看，在菲律宾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华侨作为建筑建造人员，先以传统中式建筑建造认知对海外建筑进行经验性塑造，并在建筑风格融合实践不断被接纳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多风格糅合式”民居建筑建造认知，

并不限定于某一种具体的建筑样式。此外，华侨归国建造宅邸时，正值美国殖民菲律宾中后期，大量的富豪阶层开始受到建筑思潮影响开始建造“Mansion”式豪宅建筑，华侨认定此类建筑类型即身份的象征，便将相关建造范式移植家乡，而这种审美认知同时具有灵活组合的自由性，并非固有要素的转译，而是通过多种要素的收集，结合自身需求的在地重组。

全球化的均质化和异质化倾向相互渗透，华侨作为流动要素，影响着“侨居地”与“祖籍地”跨文化体系下的建筑符号的冲突与融合，进而引发“多风格糅合式”民居建筑审美的海外生成，<sup>[28]</sup>这种将多元文化符号融合进一座建筑的建造观念也在华侨心里孕育而生，并在祖地建筑的宅邸之中得以显现，这或是“番仔楼”生成的另一种解释维度。

### 3. 宗族、礼俗与家国观念的返嵌：具身侨村后地方性文化基因的表征

作为“侨村”的梧林传统村落，未因华侨的海外生活背景而完全改变其传统居住空间的营造观念，虽在华侨宅邸中显现出突出的外来审美要素，但传统闽南村落的地方性文化基因不断返嵌，依然遵从闽南传统村落的两套典型系统：血缘宗族系统与礼俗信仰系统。<sup>[29]</sup>

从梧林村中可以洞见，华侨宅邸并非如传统乡村新建建筑集中在一个片区，独立于原生村落之外，而是都紧邻祖宅，且与亲属的房屋相邻，呈现出“番仔楼”与闽南大厝交替布局的混合聚落结构，形成多个向心状建筑组团。其原因归因于在海外生活时，闽南人仍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状态，祖地文化的影响力并未瓦解。菲律宾人类学者阿图罗·帕乔(Arturo Pachó)曾在其民族志工作中描述菲律宾华人的家庭制度：



菲律宾华人家庭制度在人类学上可以被描述为“家族制”（即“宗族制”），其特点是小家庭的结构往往依附于大家族。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家”由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五代人组成，但两三代人聚居在一起更为常见。有许多家族成员即使住在不同的城镇、省份，甚至其他国家，但在这种家族制度下，土地观念、居住方式与空间结构依旧延续。其对“宗族”观念的高度统一性显化在几个方面：（1）重视祖宅的保护，禁止出售宅基地。（2）宗族成员在一个区域聚集居住。<sup>[30]</sup>

这种宗族聚居制度恰与闽南传统村落一致，且当华侨具身家乡后，在稳固执行的社会氛围下得以自然延续，同时又在与侨眷和本地人交往过程中被不断强化。

血缘宗族系统对于梧林传统村落格局的塑造是较为宏观的，而信仰礼俗作为流淌于梧林华侨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间接影响着村域内部更为具体的物质环境建设。<sup>[31]</sup> 基于信仰礼俗系统，在梧林村中注重“境域”的范围划分，其具有一种无形的空间边界，即相同信仰群体的精神边界构成的“境界”。随着梧林村人口的不断增加，“村域”的扩张促使“境界”不断拓展，而在“境域”内进行的仪式活动也在持续塑造“村域”的物质空间。例如，梧林村内每年都会进行“游神”“巡境”“踩街”等信仰仪式活动，这些动态的活动需要在村域内的特定的仪式场所进行，并延伸至几乎每家每户的私人场域。有趣的是，为了“巡境”的顺利，华侨与侨眷会自发出修缮村内道路，这种看似非物质化的民俗信仰行为也间接提升了村落街巷的通达性与交通流线系统的完整性，<sup>[32]</sup> 构成了“传统精神空间”与“现代物质空间”的互动关系；在以“家”为单位的礼俗活动中，其对空间的需求由公共空间转向私家场域，这与信仰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发生重叠，直接导致华侨宅邸前方不同于直接毗邻道路的“Bahay na Bato”或是拥有精致花园的“Mansion”建筑前庭空间，而是融合传统闽南大厝以功能性为主导的“石埕”空间结构，以同时兼备“巡境”时神明停留施以“法力”、婚丧嫁娶时举行仪式、日常晾晒休憩等实用性复合功能。

在上述地方性文化基因的催化作用下，梧林华侨对祖地的归属感转化为对祖国的认同感，对家乡与祖国的宏大情感在其私家宅邸的建设过程中走向统一，在梧林华侨宅邸建筑界面上生成出一种“家国同构”的叙事。例如，为资助国家抗战而停工尽显斑驳的“朝东楼”、为保卫家园而在建筑墙面增设“枪眼”的“五层厝”、为支持家乡教育而转作校舍的“顺意楼”、从名字到装饰都直抒胸臆的“胸怀祖国楼”。这种将家国观念嵌入宅邸建设的华侨集体行动，其生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虽然华侨带着财富回到家乡建造“番仔楼”，是他们向乡亲表现“闯荡成功”的证明，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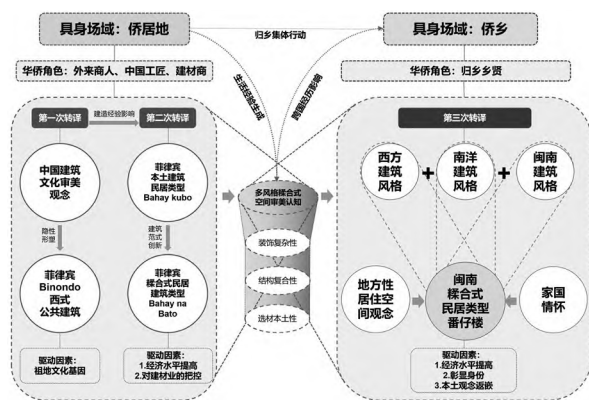


图8 旅菲华侨跨国居住空间的三次转译过程与结果

与此同时，他们在海外被迫使用外国名字、遵守殖民者规则的经历，又让他们担心被家乡视为“数典忘祖”，于是建筑上的爱国符号或成了最直观的身份证明；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积贫积弱，屡遭侵略，而菲律宾华侨又长期在海外面临殖民统治的压迫、居住范围的控制与排华政策的威胁，这种夹在祖国苦难与海外歧视之间的处境，使得华侨在归国建造宅邸时，通过爱国表达来纾解“家仇国恨”，本质上是对海外殖民文化的无声对抗，及对压抑记忆的补偿性宣泄。

综上所述，在血缘宗族系统和礼俗信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即便梧林华侨宅邸已然经历外来建筑审美观念的“转译”，但深藏于华侨文化基因中的地方性知识与认同，在归乡后仍然以一股强势的力量返嵌进其建造过程中。在此闽南华侨跨国“转移性”设计机制叙事形成闭环，并在华侨宅邸的有效保护下落地生根，代代相传，渐渐融入新时代的闽南华侨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图8）。

## 四、结语

文章突破传统侨乡研究的静态视角，以“转译性”设计为核心概念，通过设计人类学视阈，构建了“身份认同—空间塑造”互动的动态分析框架，探讨了华侨跨国居住空间的“转译性”设计机制及其对地方性塑造的影响。通过历史回溯发现，闽南华侨在菲律宾的生存实践中，不仅主动适应异国环境，更通过建筑实践将中式技艺与审美观念植入当地空间，形成独特的文化糅合范式。这种跨文化经验在归国后进一步演化为“番仔楼”的建造逻辑，西式形制包裹传统内核，既彰显其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又隐含着对祖地文化的坚守。研究揭示，华侨空间营造的本质是多重认同交织的动态过程，海外经历催生了“向上比较”的审美模仿，而家国苦难与殖民压迫则激发了建筑符号中的爱国叙事，街巷格局、宅邸形制乃至装饰细节亦映射出“地方性知识”的返嵌与再生产，希望本研究的视角与观点能为当代侨乡文化振兴与遗产活化提供理论启示。



## 图片来源:

图1 作者自绘。

图2 菲律宾Bahay Tsinoy博物馆、菲律宾30 YEARS版画画廊。

图3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图4 塞维利亚印度群岛档案馆、菲律宾CHINATOWN Museum。

图5 菲律宾30 YEARS 版画画廊。

图6—图8 作者自绘。

## 参考文献:

- [1]杨勇,邹永广,孙琦.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J].热带地理,2022,42(1): 29-42.
- [2]陈伟明.十六至十八世纪闽南华侨在菲律宾的经济开发与历史贡献[J].海交史研究,1997(1): 101-109.
- [3]陈恒汉.闽潮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流播[J].东南传播,2018(10): 64-67.
- [4]杨思声.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文化景观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220-228.
- [5]江柏炜.“五脚基”洋楼:近代闽南侨乡社会的文化混杂与现代性想象[J].建筑学报,2012(10): 92-96.
- [6]王珊,杨思声,余浩淼.骑楼文化研究:跨境方言“五脚基”的起源及其语义演变[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27-35.
-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张作成,车仁维,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75-101.
- [8](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志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9]Antonio de Morga.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 and 2[M].Cleveland,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1907:113.
- [10]陈金梅.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下的中国文化想象——以语言接触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2024(2): 171-180.
- [11]范启华,吴建省.浅析西菲时期闽南语音译词“SANGLEY”的汉语词源问题[J].福建史志,2021(2): 34-40.
- [12]Akpedonu E, Saloma-Akpedonu C. Manila's "Chinatown" Globalization and Built Heritage[J]. Social 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 2017, 5:3.
- [13]Luisa Yap.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J]. China Perspectives, 1998(20):53-56.
- [14]庄国土.菲律宾华人通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179-180.
- [15]Christina H. Lee. Domingo de Salazar's Letter to the King of Spain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582)[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37-52.
- [16]Gramsci A, Hoare Q, Nowell-Smith G.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75

[17]Fernando Nakpil Zialcita. Authentic though not exotic: essays on Filipino identity[M].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1-147.

[18]Pedro Luengo Gutiérrez. DISSOLUTION OF MANILA-MEXICO ARCHITEC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1785 AND 1810[M].Sevill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Sevilla,2017: 127-128.

[19]Pedro Luengo. Archite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hinese Quarters[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23, 49(4): 745-766.

[20]Elliott C. Arensmeyer. The Chinese Coolie Labor Trade and the Philippines: An Inquiry[J]. Philippine studies, historical & ethnographic viewpoints, 2019, 28(2): 184-192.

[21]Hodder R. Overseas Chinese and trad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the intertwining of family, social, and business interests in promoting trade[M].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87-90.

[22]Ollé M. Interacción y conflicto en el paríen de Manila[J]. Illes i imperis, 2013(10/11): 61-90.

[23]VIRAPHOL S. Finding the Way Out of Kampuchea[J].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981, 3(3): 235-243.

[24]Pacho A.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s: Status and Conditions[J]. Sojourn (Singapore), 1986, 1(1): 76-91.

[25]WEIGHTMAN G H. The Philippine Chinese: From Aliens to Cultural Minorit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985, 16(2): 161-179.

[26]杨勇.旅游开发影响下侨乡社区空间重构对华侨华人祖地认同影响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23: 74-82.

[27]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1954, 7(2): 117-140.

[28]丁凡倬,张继晓.从私家到公共:鼓浪屿中西糅合式华侨建筑装饰的持续性演进[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 30-37.

[29]苏彬彬,朱永春.传统聚落中民间信仰建筑的流布、组织及仪式空间——以闽南慈济宫为例[J].城市建筑,2017(23): 43-45.

[30]Arturo P.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s: Status and Conditions[J]. Sojourn (Singapore), 1986, 1(1): 76-91.

[31]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73-375.

[32]章倩.晋江传统村落礼俗空间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9: 38-48.

(责任编辑:尚澎)

# Abstracts:

## A New Study of Five Calligraphic Works from the Song Dynas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uang Guanghui

###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creation dates, recipients, and authors of five calligraphic work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e *Zhanhuai Tie* was written during the Xining period and was addressed to Han Qi. The *Rushu Tie* was compos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Chongning period, with Gong Guai as its recipient. The author of the *Zian Tie* is likely Pi Gongbi, and it was sent to Yang Wei. The *Zhongyong Bigong Tie* is related to the Jinshi gathering activities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Shaoxing period. The *Weiyang Tie* was written by Li Shoupe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Shaoding period. A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se calligraphic works can provide critical evid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alligraphic work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bureaucratic system; dating; recipients

## From Ornament to Aesthetic: The emergence of grotesque visual strategies in the late Renaissance

Wang Qiqi

### Abstract

The term 'grotesque' originally referred to Roman decorative mural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hrough the creative adaptation by Renaissance artists, it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ubsidiary ornamental element into an expressive artistic languag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visual strategies of late Renaissance Mannerism.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this style reflects its shift from marginal decoration to visually dominant art, and also offer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rotesqu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 Key words

late Renaissance; grotesque; decorative art; mannerism

## Visual Compensation and Symbols of Power: A study of Song-Yuan shanshui painting elements and mult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14th-century Persian Miniatures of the *Great Mongol Shahnameh*

Cheng Yajuan

### 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miniatures in the *Great Mongol Shahnameh*,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encounter between Song-Yuan shanshui painting and mult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14th century.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dawn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Ilkhanate artists sought to address the lack of mid-ground and far-ground depth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by incorporating Song-Yuan shanshui painting elements. Through the mature spatial symbolism of Song-Yuan shanshui paintings, they achieved "visual compensation," using the "form of true mountains" to compensate for th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Gothic planar narratives. This resulted in a distinct style of Ilkhanate miniature painting, whi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symbol of power and gained widespread cultural recognition.

### Key words

Great Mongol Shahnameh; Song-Yuan shanshui painting; Miniature; symbols of power

## From Carrier and Medium to Service: A study on artistic intervention in rural spac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countryside

Zhang Bo, Bao Yuqing, Qi Yao

###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pathways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 in the British countryside dynamically evolved alongside policy adjustments and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Based on the "O-SSD" speculative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explores an evolutionary system progressing from carrier, medium to servic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experimental creative practices at Charleston Farmhouse, it constructed a core strategic framework encompassing dimensions such as the topology and production of the city-art-countryside relationship, the interactive boundaries between residents and tourists in living and touring, and cultural genes-identity retrospec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cross-cultural experienti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 Key words

artistic engagement; spatial strategy; British countryside

## Local context or overseas experience: A study on the translatable design mechanisms of the architecture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Philippine) villages in southern Fujian

Ding Fanzhuo, Li Chaoyang

###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ave shaped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ir living spac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Southern Fujia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dopts a design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hrough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dentity formation-spatial construction," it traces the diachronic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s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al" design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ir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s are expressed in residential space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ive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national design practices of their living spaces.



###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living space; transla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design mechanism research

## Boundary, Apparatus, Constructedness: On the problem of the “large-scale scen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Chen Guosen

###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scen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is not primarily a matter of “theatricality,” as Michael Fried argues, which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ewer and the work. The revival of the “scene” form after the 1970s brought an unprecedented awareness of the “boundary.” However, this boundary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apparatus,” which reshap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otograph and its referent. Through its high degree of “constructedness,” it visually internalizes various material-discursive practices and ultimately shapes the “scene” through a constitutive exclusion.

### Key words

scene; boundary; absorption; apparatus; indexicality

## Giorgio Vasari’s Project of “Deification”

LI Xiao, Su Rong

### Abstract

In *Lives of the Artists*, Giorgio Vasari shaped the image of the “divine artist”, exemplified by Michelangelo, through rhetoric and art historical narrative. This title encompasses moral, humanistic, and technical dimensions, with Vasari's interactions with humanists like Pietro Aretino contributing to the project of “deification”. The “divine artist” image is not merely a personal evaluation, but a product of collective knowledge, cultural politics, and official ideology,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naissance art from manual craft into a revered form of knowledge.

### Key words

Giorgio Vasari; divine artist; Michelangelo

## Frag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Large-Scale Timbe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al history of Ink Masters of the Dong Minority

Chu Xingbiao, Yu Haoming, Liu Qingtao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Dong Large-Scale Timbe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is study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oral narration from ink masters (Master Carpenters), thick description,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o address three key issues: the reasons for the esoteric nature of its inheritance, the forms of its fragment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is esoteric, primarily because the architectural system encompasses a mental calculation system and ritualistic procedures. Fragmentation refers to the

diversified composite forms emerging as ink masters engage with and participate in contemporary design practices. When ink masters operate within a modern society context, the mode of inheritance manifests as a integration with the times.

### Key words

Ink masters; Oral history; Large-Scale Timbe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Skill inheritance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Elegant Aesthetic Cre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Design Framework

Zhang Linghao, Wang Dan

### Abstract

Elegant aesthetic creation constitutes a vital compon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core concept in life aesthetics. Historically shaped by the triad of “culture, objects, and people,” it has shaped the philosophy and scope of life-oriented creation. Thi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system closely aligns with contemporary desig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fore, grounded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elegant aesthetic cre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from a design perspective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including design aesthetic paradigms, humanistic life philosophies, and digit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The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style design language and the re-building of aesthe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 Key words

elegant aesthetics; cre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design framework;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Donor Monk Figures in the Bezeklik Caves: Using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gao Caves at Dunhuang as Clues

[Japan] Kōichi Tachidō (Translated by Yan Zhujun, Zhen Guangcheng)

###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Brāhmī Sanskrit inscriptions accompanying the donor monks in the main chamber of Mogao Cave 148 at Dunhuang,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ir similarities to inscriptions of monks depicted in Indian-style kasayas in Cave 20 of the Bezeklik Cav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onks depicted in Mogao Cave 148 were granted golden seals by the Khagan in Uighur Buddhism. Furthermore, the donor monks in both Mogao Cave 148 and Bezeklik Cave 20 are shown with decorated straps hanging over their right shoulder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purple robes”, a mark of high honor in Chinese Buddhism.

### Key words

Uighur Buddhism; Mogao Caves; Bezeklik Caves; donor monks; Brāhmī inscriptions